

二十五史随话



人民教育出版社

K504.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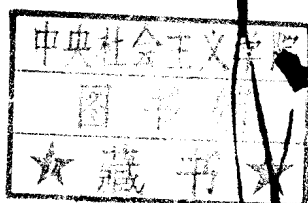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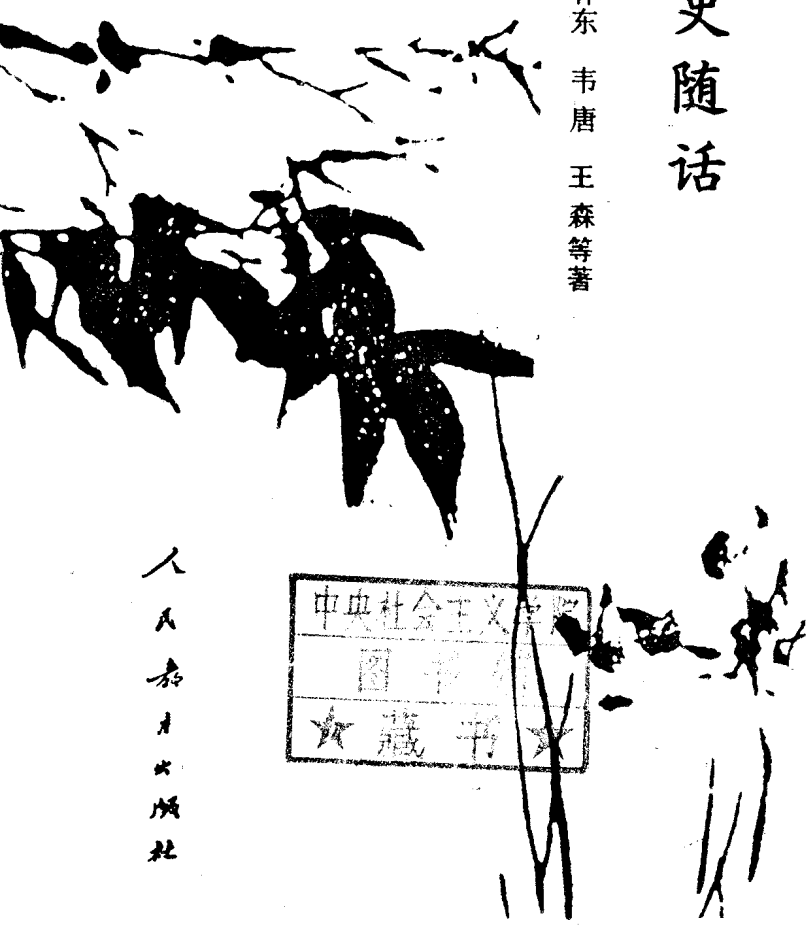
71697



200310323

二十五史随话

瞿林东 韦唐 王森等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

二十五史话

瞿林东 等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

新华书店北京科技发行所发行

北京潮白印刷厂印装

开本787×1092 1/25 印张4.125 字数70,000

1983年6月第1版 1988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700册

ISBN 7-107-10092-0 /C·476 定价0.92元

前言

我国是世界上史籍最丰富的国家。仅以作为“正史”的纪传体史书而言，魏晋南北朝有“三史”之说。尔后，唐有“十三史”、宋有“十七史”、明有“二十一史”、清有“二十二史”和“二十四史”之说；至本世纪二十年代，乃有“二十五史”之说，这还不包括《清史稿》在内。“二十五史”加上《清史稿》，撰者以百数，成书时间前后相距两千年，而部帙则达四千零十五卷之巨。它们采用本纪、列传、表、志几种体例综合表述的形式，记述了我国上自传说中的黄帝、下迄有清一代的全部历史进程，是反映中华民族历史面貌的最重要的历史文献。

“述往事、思来者”，“察往”而“观来”，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鲁迅曾说：“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这是对这一传统的很好的概括。生活在社会主义时代的人们，为了当前的社会实践和创造美好的历史前途，为了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和振奋民族精神，对于“二十五史”这样重要的史学遗产，应当有所了解，进而批判地继承

下来。这本小书，就是为了帮助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了解“二十五史”而写的。它在表述上的要求是：文字简洁、准确，重点鲜明、突出，寓科学性于通俗性之中。我们未必能达到这个要求，但毕竟是朝着这个目标去做的。

《二十五史随话》所收各篇，原是作者应《中国青年报》“自学之友”专栏之约撰写的；每篇限一千五百字，在报上连载。据说，它们在读者中的反映还是不错的。现在，人民教育出版社打算把它们编辑起来出版，说明读者是需要它们的。出版之前，各篇都由原作者作了补充和修改；因意在简要，故补充是极有限的。《清史稿》不在“二十五史”之内，但它是人们了解清代历史的重要文献，故亦为专文评介，附于《随话》之后。

采用生动活泼的形式，使史学走向社会、服务社会，这是需要许多史学工作者认真来做的。这本小书在这方面是一个初步尝试，究竟做得怎样，尚有待于读者和专家的批评。

本书在编辑过程中，承蒙《中国青年报》原“自学之友”专栏焦会民、曹凤霞二位同志的大力支持，特此致以热忱谢意。

瞿 林 东

1987年6月1日记于北京师范大学

目录

前言	瞿林东 (1)
我国的第一部“正史”	
——司马迁的《史记》	肖黎 (1)
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	
——谈《汉书》	孙恭恂 (7)
《后汉书》的特点	王兰锁 (12)
谈谈《三国志》	王兰锁 (17)
《晋书》的成就	瞿林东 (22)
沈约撰《宋书》	瞿林东 (27)
宗室·良史·《南齐书》	瞿林东 (32)
姚氏父子与《梁书》、《陈书》	瞿林东 (37)
《魏书》的风波	瞿林东 (45)
《北齐书》的厄运与幸运	瞿林东 (50)
《周书》三题	瞿林东 (55)
怎样读《南史》、《北史》	瞿林东 (60)
重在以史为鉴	
——谈《隋书》的特点	韦唐 (68)
《旧唐书》的坎坷命运	韦唐 (73)
《新唐书》的得失	韦唐 (78)

DQ.40/03

失而复得的《旧五代史》	韦 唐 (83)
欧阳修为什么要修《新五代史》	韦 唐 (88)
篇幅居二十五史之冠的《宋史》	王 森 (93)
以列表见长的《辽史》	王 森 (97)
约而不疏 瞻而不芜	
——谈《金史》	王 森 (102)
原始史料丰富的《元史》	王 森 (107)
百川归海的《新元史》	王 森 (112)
三易其手的《明史》	韦 唐 (117)

附录

一部正史的未定稿	
——谈《清史稿》	张显传 (122)
二十五史概况表	(127)
(附《清史稿》)	

我国的第一部“正史”

——司马迁的《史记》

肖 黎

我国一向把二十四史称为“正史”。“正史”的称呼是从《隋书·经籍志》起始的。清乾隆年间编《四库全书》时，正式确定纪传体史书为“正史”，经过皇帝“宸断”，共列二十四部。1921年，北洋政府大总统徐世昌下令，将《新元史》列为“正史”，与旧有“二十四史”合称二十五史。

《史记》为二十五史之首，作者司马迁，字子长，西汉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由于史料不足，司马迁的生卒年代难以考证准确，约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卒于汉武帝征和三年（前90年）左右。

汉武帝时期，经济发展，政权稳固，学术文化空前繁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鼎盛时期。因此，按照封建地主阶级的需要编写一部历史著作，已成为时代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司马迁继承父志，承担起撰写《史记》的重任。他二十岁时，曾不畏艰险，出游祖国的大江南北，沿途考察了许多名胜古迹，访问了大量的历史遗事，为以后编写《史记》积累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汉武帝元封三年（前107年），司马迁任太史令，开始阅读皇室所藏典籍，搜集史料。当他开始撰述《史记》时，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解，得罪入狱，惨遭腐刑。“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司马迁蒙受奇耻大辱后在《报任安书》中讲的这句名言，表明他置生死于度外，立志修史的决心。此后，他不顾残废的身体和巨大的精神创伤，忍辱发愤，把全部的心血都放在撰写《史记》上。汉武帝征和二年（前91年）前后，司马迁终于写成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这部体大思精的史书的贡献和特点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

（一）开创了“纪传体”体例。何谓纪传体呢？纪，指本纪，即皇帝的传记；传，指列传，是一般大臣和各式人物的传记。历史人物是丰富多采的，历史现象是纷纭复杂的。怎样才能把大千世界的各种人和事都包容在一部书里呢？司马迁在前人的基础上，

在《史记》中以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结构，创造性地探索了以人物为主体的历史编纂学方法。“本纪”按年代顺序记叙帝王的言行和政迹；“表”按年代谱列各个时期的重大事件；“书”记录了各种典章制度的沿革；“世家”载述诸侯国的兴衰和杰出人物的业绩；“列传”记载各种代表人物的活动。司马迁创造性地把这五种体裁综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统一体系。

(二)《史记》开创了政治、经济、民族、文化等各种知识的综合纂史方法。它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时期，记载了我国近三千年的历史。全书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多字，成为我国第一部规模宏大、贯通古今、内容广博的百科全书式的通史。在《史记》中，司马迁第一个为经济史作传：《平准书》、《货殖列传》；司马迁又第一个为少数民族立传：《匈奴列传》、《西南夷列传》等；他还第一个为卑微者列传：《刺客列传》、《游侠列传》等。《史记》第一次把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包容在历史学的研究范围之内，从而开拓了历史学研究的新领域，推动了我国历史学的发展。由于纪传体可以容纳广泛的内容，有一定的灵活性，又能反映出封建的等级关系，因而这种撰史方法，为历代史家所采用，影响十分深远。

(三)秉笔直书，是我国宝贵的史学传统，司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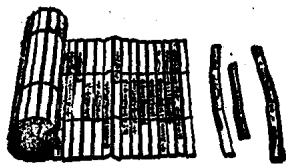
迁的《史记》对此有很好的发挥。所谓秉笔直书，就是史学家必须忠于历史史实，既不溢美，也不苛求，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撰写历史。《史记》明确表示反对那种“誉者或过其失，毁者或损其真”的作法。项羽是司马迁心目中的英雄，因此，司马迁以极大的热情和强烈的爱记述了项羽的伟业。但对于项羽的骄傲自大和企图以武力征服天下的致命弱点，司马迁也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对于先秦的法家和秦代的暴政，从感情上司马迁是愤恨的，但他做到了不因憎而增其恶。相反，对法家的改革和秦代统一中国的历史作用，他都予以充分的肯定。正因为司马迁的实录精神，才使《史记》以信史闻名于世。《史记》还贯穿一条重要线索，即重视人的历史作用。司马迁是反天命的，强调人是历史的中心。因此，他在写帝王将相的同时，注意为社会上的各种人立传，尤其是把农民起义的领袖陈胜、吴广，放到与王侯功臣以及封建社会的圣人孔子同等的地位来写。所以在《史记》中，既有战国七雄的世家、萧丞相（萧何）、留侯（张良）的世家、孔子的世家，同时也有《陈涉世家》。司马迁也很重视物质生产活动在历史上的作用，把经济状况同政治上的治乱兴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还强调总结历史经验，提出以史为镜、鉴往知来的思想。由于司马迁在历史编纂学上的伟大创造精神，他的进步的史学思想和严谨的治

史方法，使《史记》成为我国史学史上一座巍峨的丰碑，司马迁也赢得了“中国史学之父”的美名。

(四)《史记》也是一部形象生动的历史，它的文采历来为我国文学界所称颂，它开创了我国传记文学的先河。司马迁象一个出色的画家，以他那十分传神的画笔，为我们勾画出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画像；又象一位善于捕捉瞬间的雕塑家，以他那锋利的刻刀，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个风采各异的雕像。在《史记》这座人物画廊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历史上那些有作为的王侯将相的英姿，也可以看到妙计藏身的士人食客、百家争鸣的先秦诸子、“为知己者死”的刺客、已诺必诚的游侠、富比王侯的商人大贾，以及医卜、俳优等各种人物的风采，给人以美的享受和思想上的启迪。司马迁创造性地把文、史熔铸于一炉，为我们写下了一部形象的历史。所以，鲁迅先生称赞《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正因为如此，在我国浩瀚的史著中，《史记》拥有的读者量是首屈一指的。

《史记》在我国比较广泛地传播流行，大约是在东汉中期以后。它成为司马迁著作的专称，也开始于这个时候。在这以前，《史记》都称为《太史公书》、《太史公记》和简称“太史公”。据现知材料考证，最早称司马迁这部史著为《史记》的，是东汉桓帝时写的《东海庙碑》。到唐朝时候，由于古文运动的兴起，

文人们对《史记》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当时著名散文家韩愈、柳宗元等都对《史记》特别推崇。宋元之后，欧阳修、郑樵、洪迈、王应麟各家，以及明朝的公安派、清朝的桐城派，都十分赞赏《史记》的文笔。于是《史记》的声望随日俱上，各家各派注释和评价《史记》的书也源源不断出现。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俗称“三家注”的《史记集解》（刘宋时裴骃注）、《史记索隐》（唐司马贞注）和《史记正义》（唐张守节注）。《集解》兼采当时裴骃所能见到的前人有关《史记》诸书的研究成果，并一一注明作者名字，一丝不苟。《索隐》进一步指出了《集解》中考证不当的错处，并对《史记》原文提出辨正，发语警辟。《正义》的作者长于舆地之学，对《史记》中地名的考证尤为精辟。读《史记》原文，同时注意看一看这三家注，对原书会有更进一步的理解。1959年中华书局重新标点排印的《史记》，就是与这三家注合刻的本子。



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

——谈《汉书》

孙恭恂

《汉书》，又称《前汉书》，一百二十卷。其主要记述起于汉高祖元年（前206年），止于王莽地皇四年（23年），囊括了西汉一代（包括短暂的王莽政权）二百三十年的史事，是继《史记》之后我国古代又一部重要史书。

它的编著者班固（32——92年），字孟坚，东汉扶风安陵（今陕西省咸阳市东）人；“自幼聪敏”，“九岁能属文，诵诗赋”；成年后博览群书，“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由于《史记》只写到汉武帝的太初年间，因此，当时有不少人为它编写续篇。据《史通·正义》记载，写过《史记》续篇的人就有刘向、刘

歆、冯商、扬雄等十多人，书名仍称《史记》。班固的父亲班彪对这些续篇感到很不满意，遂“采其旧事，旁贯异闻”，为《史记》“作《后传》六十五篇”。班彪死后，年仅二十几岁的班固，动手整理父亲的遗稿，决心继承父业，完成这部接续《史记》的巨作。不料，工作开始几年，有人上书汉明帝，告发他“私作国史”。班固蒙冤被捕入狱，书稿也被全部查抄。后来，多亏其弟班超到京师洛阳，上书辩白，朝廷才将他释放。这样，班固的书稿被汉明帝看到。明帝很赏识班固的才气，召他到洛阳，任以兰台令史之职，随后又迁升为郎，典校秘书，并让他继续完成修史任务。从此，班固正式开始了《汉书》的编著。他精心苦思，反复修改，经二十五年，终于在死前完成了这部著作的大部。余下未定稿的“表”和“天文志”，则是由他的妹妹班昭和同乡马续写就的。

《汉书》这部史学巨著，有记叙西汉帝王事迹的“纪”十二篇；志各类人物生平及少数民族、外国情况的“传”七十篇；专述典章制度、天文、地理和各种社会现象的“志”十篇；史“表”八篇。全书八十万字。书中的史料十分丰富翔实。汉武帝以前部分，基本上依据《史记》写成；汉武帝以后部分，除吸收了班彪遗书和当时十几家读《史记》书的资料外，还采用了大量的诏令、奏议、诗赋、类似起居注的

《汉著记》、天文历法书，以及班氏父子的“耳闻”。不少原始史料，他都是全文录入书中。如《贾谊传》录入了《治安策》等奏议；《晁错传》录入了《举贤良对策》、《教太子疏》等奏疏。以前，有人从文学角度批评《汉书》说：“孟坚所掇拾以成一代之书者，不过历朝之诏令，诸名臣之奏疏尔。”其实，从史书看，这正是它的优点。许多原始史料，今天已经看不到，多赖《汉书》收入，为我们保存下来。《汉书》的“志”即是《史记》的“书”，但比《史记》增加了《刑法志》、《地理志》、《艺文志》和《五行志》四篇，所包容的历史现象更为博大丰腴。特别是《艺文志》，记述了当时和前代的书籍源流、存佚、内容，并作了分类，是我国留存最早的一部目录学书。以后的“正史”大多效仿它，写入这部分内容。作为史书，在叙事上，《汉书》的特点是注重史事的系统、完备，凡事力求有始有终，记述明白。这为我们了解、研究西汉历史，提供了莫大方便。至今，凡研究西汉历史的人，无不以《汉书》作为基本史料。

就体裁论，《汉书》与《史记》同为纪传体史书。不同的是，《史记》起于传说“三皇五帝”，止于汉武帝时代，是一部通史；而《汉书》却是专一记述西汉一代史事的断代史。这种纪传体的断代史体裁，是班固的创造。从此以后，历代的“正史”都采用了这种体裁。这是班固对于我国史学的重大贡献。《史

通·六家》说：“如《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炼，事甚该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自古迄今，无改斯道。”刘知几的这个评价，今天看来还是很公允的，它道出了班固及《汉书》在我国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毋庸讳言，作为一部封建史书，《汉书》在指导思想上有明显的封建性。它宣扬汉家王朝上“承尧运”，“以建帝业”；汉高祖刘邦“实天生德，聪明神武”。这就为当时以继承西汉正宗而建立起来的东汉封建统治，披上一层神秘外衣，制造了其存在的神学合法依据。《汉书》认为，人民对于封建统治者，应该有“守职奉主之义”，必须服服贴贴地做到“小不得僭大，贱不得逾贵”，维护封建社会的等级统治秩序。不难看出，班固的史学思想正是时代和他本人情况的反映。当时的东汉王朝，专制主义封建制度已经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班固师承儒家正宗之学，又有着封建官宦的家世。这一点与司马迁作《史记》时的情况已经大不相同。历来人们喜欢对比班（班固）马（司马迁），但是必须首先分析其时代的同异和个人经历、家世之差别，然后才可以得出历史主义的正确认识。否则，或褒或贬都会失去应有的依凭。《汉书》的封建正统思想，对于我国后世的正史，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